闻一多研究动态

第一三二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8 年 4 月

===

▲　《闻一多故乡——巴河古镇》出版

由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委、镇人民政府编辑的《闻一多故乡——巴河古镇》近日出版。该书全面展示了巴河古镇千年人文风采、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俗民风。巴河镇位于湖北东部，长江中游北岸，与鄂州、黄石隔江相望，这里不仅山水秀美，而且有着丰厚文化底蕴，是鄂东历史名镇，也是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故乡。《闻一多故乡——巴河古镇》是一部巴河古镇的千年简史，内容分为主体概况篇、人物篇、风景篇、美食篇、风物篇、发展篇。书中收录古今名人 48 位，自然和人文景点 29 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芝麻湖九孔藕”“望天湖胖头鱼”等美食 16 种，以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河天狮”等风物 32 样。（据新华网武汉 3 月 15 日消息）

~~~~~~

▲　戚慧对闻一多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研究

武汉大学文学院戚慧在《闻一多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历时性研究》（《语文建设》2017 年第 4 期）中，对中学语文教材选入的闻一多作品脉络做了疏理与研究。文中指出，自 1932 年至 2016 年，闻一多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共 19 篇（首），其中 1932 年到 1949 年选入的有散文《青岛》，新诗《太阳吟》、《一个观念》、《故乡》、《末日》、《罪过》、《你看》、《一句话》、《发现》、《天安门》10 篇（首）。“《青
~~~~~~

岛》是闻一多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青岛大学执教期间所写，是他仅有的一篇写景抒情散文。民国时期，《青岛》曾先后 7 次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当时中学语文教材对白话散文的选编还未形成完善的系统，篇目选编以近似题材、体裁的文章为一组，在课后作简单的题解和写作背景说明。因此关于这篇散文的艺术手法、语言特色，教材中只字未提。对《青岛》的阐释基本是从记叙文文体出发，注重写景状物，未从思想上和写法上进行具体说明。”对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 9 首新诗，文中说：“研究发现，《死水》集比《红烛》集更能得到中学语文界的认可。教材‘作者介绍’强调闻一多的诗人和学者身份，‘说明部分’、课后习题和诗歌的解释比较简单，注释也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比较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学语文教材均选入了闻一多的作品，但对闻一多作品的成就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教材编者比较认可的是《死水》集的诗歌，这也体现了编者在选择上的单一，主题理解上的单调，更没有对闻一多诗歌的语言、艺术技巧等进行具体、深人的分析。”

解放后十七年，对闻一多的研究由于深受时代环境影响，特别是响应毛泽东“要写闻一多颂”的号召，闻一多作品的入选是以国家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为依据，并切实把握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思想性特性，教材选入的闻一多作品有《最后一次的讲演》、《发现》和《一句话》。其中“《最后一次的讲演》是闻一多思想转变的重要体现，是对其晚期身份认定及政治定位的有力证明。这篇演讲自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入选初中语文教材，成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宝贵资源。‘十七年’时期，《最后一次的讲演》曾两次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课文明显经过改动，从‘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之后删去 300 多字。删去这些文字可能基于以下理由：一是闻一多对美国的判断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内战的；二是讲演中对司徒雷登的赞美，与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的评价相左。课文后附有‘注解’和‘提示’。‘注解’对闻一多的生平作简要介绍，与民

国时期的‘作者介绍’相比，更加强调闻一多后期的政治活动。‘提示’说明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基本内容，鲜明陈述闻一多的政治身份和立场，充分肯定闻一多在号召革命、推翻‘蒋匪帮’的血腥统治上的作用。此后很长时间里，人教版教材的解读一直沿袭这一解读模式。这一时期，教参的解读成为师生理解闻一多作品的重要参照尺度，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编写者对教材的选择缺乏理性的思考或受极‘左’方针的影响，一味地突出闻一多作品的思想内容，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发现》、《一句话》两首新诗，“因符合时代的要求而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被教材以隐性的方式‘经典化’。教材编写者有意夸大闻一多诗歌中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诗歌的评价和阐释被纳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范畴，解读角度单一、片面。在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四册）》中，‘注释’部分解释了诗歌中难懂的词语，‘课后练习’强调对《发现》、《一句话》思想感情和诗歌内容的解读，均未提及诗歌的艺术特色和语言特点。长期以来，《一句话》被研究者认为是新中国成立的预言。教参解读时，也注重诗歌所包含的强烈的爱国情感，《一句话》被称作闻一多式的爆发，‘咱们的中国’更是成为一种政治口号而鼓舞人心。”作者认为：从价值取向来说，十七年时期的中学教材选入的闻一多这两首诗歌，倾向是：“其诗篇内容和思想印证了闻一多为国殉难的壮烈事迹，教材选编者把闻一多诗中符合政治意识的内容放大，把容易引起质疑、混淆的内容缩小，并在教参中进行说明，建议学生不提问的内容教师可不回答。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闻一多文本的解读，遮蔽了闻一多作品的真实内涵。”

“文革”时期，“语文教育被当成政治工具，其意义仅在于满足国家政治斗争的需要，失去了教育本身的意义。中国内地闻一多作品的出版和相关评论几乎全面停滞。《语文（第四册）》选入《最后一次的讲演》，教材的前言附有毛泽东语录。‘文革’末期，教材中仍充斥着大量的政治性课文，但与‘文革’前期相比，批判性的文章已经删去，

选文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

在文学界称之为的 1978 年至 2000 年新时期，作者认为：“对闻一多作品的阐释虽未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主导论，在教学思想方面仍着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教材解读已呈现出新的面貌。对闻一多身份的认识更趋理性、清晰，‘爱国者’形象虽仍不可动摇，但作为学者、诗人、诗论家的闻一多，其丰富性逐渐为中学语文教材所意识和书写。”其中“《最后一次的讲演》作为讲读课文选入教材，‘思考和练习’对课文的解读注重启发性和引导性，让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体会闻一多的语言和精神，还设计了讲演比赛会的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作者介绍强调‘诗人、学者’身份，未列出民主战士的身份，背景介绍简洁，给师生的学习留有发挥的空间。”同时，“《静夜》入选高三《语文（第五册）》‘诗二首’。教材从时代背景角度入手解读《静夜》，在思想上表达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在艺术上强调《静夜》是一首谨严的现代格律诗，从构思巧妙、意境深邃、讲究用词、不同类型的句式的选用等方面进行分析。”《一句话》“在‘十七年’时期被看作新中国成立的‘伟大的预言’，新时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从闻一多的生平寻找解读线索，尝试还原文本意义，解读更加客观、公正。对《一句话》的解读，虽仍强调思想内容，但也注重诗歌的艺术感染作用，注意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2000 年以来的新世纪，基础教育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也拉开了帷幕，对教材、学校、教师、学生都提出全新的挑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规定：“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闻一多的作品因符合上述规定而广泛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其中《最后一次的讲演》入选多版本中学语文教材，选编系统相比之前更加成熟、完善，教材的课程资源得到全面开发。例如：“2001 年张志公编写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选入《最后一次的讲演》，题注对闻一多的身份介绍简单明了，不作政治上的引导。阅读‘提示’既概括课

文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思想感情，又提出朗读要求，还有需要掌握的字词，充分调动师生研读课文的积极性。‘实践·积累’对课文进行整体把握，既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又列举讲演稿的特征，还设置语言表达的练习，注重字、词、句的积累。教材解读不再是单纯地强调讲演的思想意义，而是从文本出发，分析讲演的艺术特点、语言应用价值。教材充分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体现了鲜明的开放性，以更好地培育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新诗方面，作者指出“学术界对闻一多诗歌研究更趋系统性和学理性，这一时期入选的闻一多新诗篇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选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死水》素来被推崇为新格律诗的典范之作。新世纪以来，多次入选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1》选入《死水》，课文题注不仅简单介绍闻一多的身份，而且对写作背景进行说明，帮助学生更好地研读诗歌。‘课后练习’强调在了解时代背景和作者思想的基础上，理解‘死水’的象征意义和诗人可能寄寓的思想感情。教材注重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让学生在朗读中自己感受诗歌的含义。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参在吸收过去教参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在课标的指导下，立足于教材，强调教材编写的意图与主旨，提供更多的是研读课文的思路，而不是一家之言的结论，激发了教师的主动性。”

“《忆菊》与《发现》凭借自身的魅力在长期的解读与接受中成为现代新诗的经典作品。2008 年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3）》的‘祖国土’模块，以‘颂歌的变奏’为主题选入《忆菊》与《发现》，引导师生对比阅读。2009 年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3）》‘祖国土’专题选入《发现》，教材设置了‘文本研习’、‘问题探究’、‘活动体验’三种注重学习过程的结构组织，对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教材内容设计强调学生对教材所提供的经典文本的阅读与理解，有意识地创设对话情境，以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细节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研读与沟通、交流。”

“《一句话》是各个时期都入选的新诗名篇，新世纪作为阅读课文入选沪教版初中《语文（第一册）》，教材编排比较简单。《色彩》多次入选初中语文教材，内容浅显，容易理解。沪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选入《色彩》，教材建议对《色彩》的理解可结合闻一多的绘画创作和‘三美’中的‘绘画美’主张而谈，引导学生理解闻一多追求诗歌色彩美中永恒的‘美的精神’。”

“《红烛》是诗集名，也是这部诗集的序诗。作为序诗，自然凝聚着闻一多最深厚的情感。《红烛》入选教育部规划教材职业高中课本，被编入第 15 课‘口语交际练习—介绍’。《红烛》是闻一多的诗歌中比较容易理解的诗篇，教材提示通过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来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和艺术精神。《太阳吟》曾多次被选入高中《语文》读本。2003 年《语文读本必修（第一册）》选入《太阳吟》，用简洁概括性的语言介绍诗歌创作背景，提供进一步解读诗歌的诗人自述资料，提示朗读时注意诗人的情感变化，并讨论诗歌的形式美等问题，具有启发性。新中国成立后，闻一多的《洗衣歌》很少入选教材，仅在 2001 年被选入初中《语文（第八册）》15 课的‘诗三首’，教材的编排比较简单，仅列出诗歌内容。”

作者还认为：“在对闻一多作品不断解读的同时，也存在误读的现象，《也许》就是其中一例。学术界对《也许》是否为其长女立瑛而作的问题，一段时间争议不断。查阅闻一多年谱和研究资料不难推测出立瑛殁于 1926 年秋冬之际或冬季。《也许》发表时，立瑛尚在人间，《也许》并不是为立瑛所作。然而，吴思敬选编的人教版高中选修课本《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和苏教版选修教材《现代诗歌选读》及其配套教参都将《也许》作为悼念亡女的诗来处理，这样的解读显然是对闻一多诗歌的误解、错解，缩小了闻一多诗歌的解读空间。

在总结部分，文章写到：“回望 20 世纪，中学语文教材对闻一多作品的解读一直侧重于政治性阐释和阶级分析的层面，而忽视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新世纪中学语文教材对闻一多作品的选编和

选篇应该更趋于合理化，要确定适合中学生阅读的闻一多作品的篇目和数量；学术界要深度介入中学闻一多作品的选编研究；语文界要改变闻一多作品的解读方式，注重多元化思维，及时借鉴吸收学术界对闻一多研究的新成果，把有价值的资源传递给学生；教材编写者对闻一多形象的塑造不要模糊化，一味地夸大，而应该走向人性化。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应悉心挖掘好闻一多这座巨大的精神文化富矿，尽职尽责地为新世纪语文教育做出更好的贡献。”

~~~~~~

▲ **史事追踪**

【涂上飙记述闻一多主持设计武汉大学校徽】 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在《武大首任文学院长闻一多的珞珈留痕》（《档案记忆》2017 年第 10 期）中记述了闻一多与武汉大学校徽的关系。文中写到：闻一多是学艺术出身，且擅长书画，在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他被安排负责校徽的设计工作。1929 年 3 月 27 日，学校召开第 69 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制定校徽校歌一事。会议决议：全校的教职员工及学生可以充分发挥才智，设计创作校徽校歌。由文学院院长闻一多负责对所有校徽设计图样进行审核，最后提交校务会议审定。

学校通告发出后，响应者不多，且设计的图案不尽如人意。1929 年 5 月 1 日，学校第 74 次校务会议对校旗、校徽、校歌的制定作了进
~~~~~~

一步的规定：推举闻一多、陈通伯、袁昌英和时昭瀛等几位教授进行会商，设制出几套图案供全校员工选择。在大家选择的基础上，最后由闻一多审定后报校务会议决定。1930 年 6 月，闻一多离开学校后，校徽、校歌制定工作就暂时停顿下来。1931 年 2 月 20 日，学校第 109 次校务会议再次提出校徽、校歌的征求工作。由于进展缓慢，4 月 24 日的校务会议作了明确规定：在原有闻一多工作的基础上，校徽用“武大”二字，具体完成工作由刘博平、王星拱、林淑华、燕召亭、时昭瀛、陈通伯、朱东润、萧君绎等教授制定完成，报校务会议通过。最后，确定以篆体“武大”红底白字为校徽。另一种篆刻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图案作为征集过程中的备用品，最后也流传出来。总之，学校曾经使用的两枚校徽，都凝聚着闻一多的心血和汗水。

~~~~~~

▲ 昆明发现闻一多为闻家驷篆刻的名章

2017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朱原女士根据线索找到闻一多流落在昆明的一枚印章，经辨认，这枚印章是闻一多为胞弟闻家驷刻的名章。请本刊所请，朱原特撰写了《闻一多先生遗印发现记》，记录了这枚印章的发现过程，并慨允首发于本刊。

这是一个传奇故事，简单的说，两句话即可概括：闻家驷先生的印章上世纪 40 年代在昆明被抢失落，90 年代被云南文物商收入囊中。前者于 1987 年写了《遇劫记》，后者于 1998 年淘到该印，13 年后写了一篇《收藏记》。二记一京一滇，背靠背 22 年两不相知，直到 2017 年。这里记叙的，就是把前两者拼接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自最早的 1987 年到最迟的 2017 年，整整耗时 30 年，一桩公案总算有了些眉目。

是故，本记应是对旧材料的整合罢。

欲知其详，说来话长。嫌啰嗦的朋友，以下内容可以略过。

2012 年前后，我供职的出版社着手启动一套“云南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闻一多先生是其中之一。先生虽非本土人士，但云南人从来都视他为“自己人”（泰因其成果大半在此完成，宝贵生命在此
~~~~~~

终结，并无贴金之意）。云南名师刘文孝博学多识文笔甚好，又出自曾经的联大师院，更难得性笃志洁，与一多先生惺惺相惜，请他做作者再合适不过。惟该套书字数限制在 10 万，只能提纲挈领介绍传主的主要事功。《文化雄狮—闻一多》稿成，已达十三四万字，为责编的我被诟病仍不舍得删。然而就算如此也没法面面俱到，刘作偏重撷取其治学及生活等最著的五个方面。

我惭愧，闻一多先生的英名如雷贯耳，然而以往所知泛泛，太多细节方首次得知，学术之高精尖就不提了。都说他嫉恶如仇、刚烈火爆，没想到其实他宅心仁厚、柔肠百结。如对父母恭顺到不愿早婚却忍受归娶；对早夭爱女锥心泣血的诗语倾诉；对胞弟家驷盈盈信札的关心指点；对子侄冒领其工资的遮掩爱护；对学生的大加提携，自己的手稿心血不吝借出；对战友李公朴牺牲的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窃以为与华罗庚的相处最典型地表现了其纯良人品，例一：为避日寇空袭，穷乡僻壤一下子涌进巨多外地人，本来就缺衣少食的云南农民哪有多少余房可租借。当时闻家八口好不容易找到间 16 平陋屋，听说拖着一条残腿和家小六口的华罗庚无处可去，主动邀其同宿，分帘共栖一挤就是一年。想想看，两家 14 口人，巴掌大个地方，家眷要做饭，大师要工作，孩子多，又少不更事吵吵闹闹……我相信，再怎么艰窘，当年的教授中还是有家累轻、条件稍宽裕的，但是只有一多先生这样做了。例二：闻送过华一方印，谁都知道他家口负担重辛苦治印是要补贴家用的。闻华二人远非世交，近非私淑，一文一理专业殊异，闻先生急人所难雪中送炭，古道热肠毫无城府，与当今精致的利己主义更不啻天壤之别。

从业三十年，没有一本书看得我感动不已，泪眼婆娑……

一时间我言必称闻一多，引得一贯少言寡语的老爸说出几件他从未讲过的事：他和闻先生的二公子立雕曾在联大附中同班。他们的同学庄任秋，就是那天眼睁睁看着一多先生惨死来帮忙的那位。庄是华侨有家难回，出事后，他留在了云南工作，50 年代初被土匪杀害，家

父在新平烈士陵园墓碑上看到过他的名字。等等这些，我对闻先生似乎更有了一层责任和义务。

因了书的配图须取得法定拥有者授权，我托老友戴美政向闻先生的长孙黎明君求索，蒙不弃得襄助。当其时，正逢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更多的照片，他提供在了昆明的“龙泉记忆”展中。久久不能释怀的我专程前去一睹再睹，惟愿更多更近地“一亲芳泽”。2016 年一多先生逝世 70 周年，其故乡湖北开会纪念暨研讨，戴先生参会，知我痴迷，带来了黎明先生签名的《闻一多传》增订本。该煌煌大作，事无巨细翔实宏富，凡出有据审定谨严，作者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功夫，让我感佩，信服，过瘾，更多地了解了闻先生。一多先生地下有知，也定然为这样的后辈欣慰。

自此，崇仰之心愈发未有稍怠，举凡与先生大名沾个边，便敏感在意。丰赡不朽的闻一多先生是一座富矿，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研究内容，主力当然是大专院校和各种研究结构的“正规军”。围绕他的文字林林总总，可谓是汗牛充栋了，还能不能从犄角旮旯搜寻线索，捡个漏？虽才疏学浅，也望力所能及做点奉献。

我的习惯：一般自己策划的书，总尽可能了解、学习该范畴的信息和知识，意欲人无我有，人有我刁。2016 年因在编的《云南瓦当》结识了收藏人士颜荣清先生，次年 11 月下旬我去他店上参观。颜肯钻研、眼光毒、擅买卖。他什么都收，藏品驳杂，包括印章。我条件反射般马上问道“那有没有闻一多先生的呢？”居然真有！但在家里。为弥补我的遗憾，他说写进书里了，是交由云南美术出版社 8 年前自费出版的，临走他把仅剩的最后一本书送给了我。

回家第一时间就翻到相关章节，内中真的有一篇《闻一多印章收藏记》！我大喜过望，如获至宝。篇幅不长，大致内容是：笔者 1998 年 5 月的一个星期日逛旧货市场，跟随一个卖破烂的“老昆明”到其“莲花池小区”家里。当时，老头弯身从床下拖出一个坏了搭扣的精致箱子，“里边有象牙烟杆、翠玉手镯等外，六七枚印章夹杂其间”。

然而“老者一再说明家中祖物是兄弟共有，不能卖的。”被作者缠不过，勉强卖了一个。印面“皮名举”，边款“一多刻于滇垣壬午年”，琥珀印材。读毕我尤不死心，追问作者为何文中说一个，而交谈时却说有四五个？于是乎，作者发来了三枚印模图，它们是“闻家驷印”、“蔡维藩”、“王祖平印”。

迫不及待，文与图由微信传给了黎明先生，他也是欣喜万分。不两天，他发来了闻家驷先生 1987 年写的《遇劫记》。原来，家驷先生的印章是被劫流失的，这就解开了为何宝爱之物会遗落在外的谜底。抗战时期日机空袭频频，一多、家驷哥俩原先同住在城中心五华山下，因为省府就在这里，挖有防空洞。殊不知这里也遭到轰炸，1940 年 9 月 30 日一颗炸弹就扔在他们藏身洞不远的花园里，好在是颗哑弹。经此一劫，两家疏散到昆明郊区农村，本来兄弟俩在一起彼此好照应，但是难找到合适的房子，只能分住两地。弟弟搬到七八公里外的西郊大普吉，每星期三次赶来城里上课。因为空袭一般在早上，联大要求早一小时开课以避锋芒。家驷的课排在早晨，所以六点来钟就得赶路了，上完课到茶馆里小憩一下，吃点东西，再为孩子买几个热乎乎的饼，便打道回府。

那天下课照例，天光应该还是大中午。刚走到大西门不远的“一线天”峡谷，忽听后面一声断喝，两个拿枪的汉子逼先生站下。一个

立即趴在地上解他鞋带，一个就扑过来夺眼镜、怀表、挎在臂弯的夹裳。在抢手拎的蓝布袋时用力过猛，致使袋子飞出几步开外。袋中讲义、课本、饼子、几张薄钞等掉落一地，两个强盗一见钞票都忙去捡拾。先生鞋履尚未及扒掉，急忙奔逃才得以脱身（不妨脑补一下，一位留洋书生若是赤脚，该怎样对付那乡间的坎坷、刺窠）。到家才听房东讲那个地方经常出事，必须结伴而行。先生庆幸的是，那天本是发薪日但延期了，不然一个月的工资就玩完；伤心的是，因要领薪所以还带了印章，那是一哥刻的啊，就此随袋里什物一块被劫，“再也找不回来了”。文中没说具体哪一年，推测应是 1941－1943 年间吧，那时节联大已常不能按时发薪水了，连教室的铁皮顶也揭下来卖了换经费。物价天天涨，贵为教授，却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儒雅的朱自清先生甚至在乡街子淘了件极便宜的旧毛毡，那是赶马人野外栉风沐雨披的，城里苦力都不屑穿戴呀。悲怆的时代，国家的知识精英遭此厄运，叫人心酸浩叹！

读了失者的回忆，收者的讲述，我禁不住分析：那个老头想必就是盗者后人，因为他家在大西门附近的莲花池；因为这窠臼很老旧，很黑很小，楼梯很逼仄；因为他说是祖上留下来的遗物没动过；因为知是“名人”的东西，怕卖了暴露自己？估计两个强盗是兵痞，不然咋有枪呢？穷凶极恶，光天化日下就明火执仗，专拣文弱书生下手。值钱的怀表、衣裳之类拿走也就认了，连眼镜都抢——近视镜每人度数都不一样，拿了也卖不掉啊？！可惜讲义、课本与印章没在一起，否则该是铁板钉钉的文字证据了吧？我甚至想直接去采访这家人，再看再问再找找，但国人讲究的是为长者讳，若真是其祖上造的孽，肯定抵死不认。再则，还活着么？须知淘章距今已 20 年之遥。

我能做的只剩遗憾：为啥眼皮底下的出版物才看到，颜书责编还曾是我二十多年前对桌的同事呢。及时悉晓下落的话，家驷先生有生之年或许稍宽慰些，不致让失印之耿耿持续了这么多年。

2017 年 12 月下旬，闻黎明先生来昆，不止相貌毕肖一多先生，

对事业的热忱和较真也颇有乃祖之风，他为主持西南联大史料编纂事宜来往奔波多趟了。不揣冒昧，我邀他抽空同去探访收章人。23 日这天我们一起去了颜老板处，小店明显比上次人多。一干人惊呼“太像了”，争相与黎明先生合影。尽管事前我再三拜托颜带来所藏全部闻印，甚至傻傻地以为，家驷印或许会大方地完璧归赵，为原本良善的云南人扳回几分（遇劫记他看了）；尽管黎明先生拨冗亲自前来，来者不拒地合影，满满的诚意。万没想到的是，精明的老板仅带来了一枚印，其他的闪烁其词，一会说忘了，一会说又带回去了。但看其呼朋引伴地，蛮有准备嘛。

不管怎么说，当年被掳去的“闻家驷印”终于看到了。小心翼翼捧在手里，轻轻拂拭，仔细端详。心里默默道歉：玷污了、委屈了，真对不起！这是一个高约四五公分，直径约 1 公分的圆柱体印章，黄澄温润的琥珀料，在阳光下通明透亮。体量纤秀，蛮符合一枚随身携带的即时用印。要说是闲章也像，因边款不但有“一多”及疑似年份字样，还刻有一些别的文字，因琥珀折光，实在辨认不清。黎明先生当即盖了印模，带回北京家中与令祖父的印谱比对、查阅边款文字。因一般手机拍照不精，他还打算请博物馆专程来补拍。（这里随文奉上图片，拜托行家里手解读则个）

除文中载明的皮印外，另外几印又是怎么得来的呢？经当面了解，原来颜文所写并非全部实情。当时他的算计是：只买其中某物，卖家便知某物稀罕，以至于见风使帆，提高卖价，所以他就将整个箱子囫囵买下来了。我笑问：“声东击西，死缠烂打？套路深嘛。”对方点头称是，“这些很正常，买贵了或卖贱了，会在业内沦为笑柄。”突然想起他书里津津乐道了许多生意经，什么暗度陈仓，欲擒故纵……说不定对付我们的这招叫“熬鹰”，吃准你失而复得的心理，奇货可居，等着开价呢。偏偏我等书呆子根本不懂那些小九九，所以另几个也就无缘得见？这水好深哦，思虑不周我颇懊恼，更为把谦谦君子贸然领入忐忑不安，但看黎明先生，一派平和温煦，气定神闲。不求索回原物，

也不讨价还价，并且，真诚大度地感谢了收藏者。这倒是理所应当，毕竟是他走街串巷、花时间精力掏腰包、识货得来的。

我也转送了一本《文化雄狮——闻一多》给颜老板，巴望他更多地了解所拥有的宝贝背后的故事；诚望不要以为我矫情作怪，吹毛求疵，苛责于他——刘作有专节详细介绍了闻先生精妙的篆刻艺术，内中就包括闻家驷印（另枚方形），一点一画，条分缕析细致入微。一多治印虽为稻粱谋，但非仅权宜之计。而是以他一贯的精益求精，注入了毕生的学识、才情，绝不苟且马虎，有的堪称中国篆刻史上的杰作和贡献。方形“闻家驷”这枚即是，圆形虽小，构思基本相同，又何尝会弱呢？

说到“王祖平印”，颜以为是中共云南地下党的。而黎明先生介绍说，是爷爷为云南民盟组织部刻的，家藏印谱上有。此印一般认为是李公朴先生所持，李被害后，印章不知所踪，末了却与家驷这枚躺在一起相依相伴，也算得其所终？蔡维藩是联大政治系教授，与一多先生有过共同的活动，不过也有政见之左。至于“蔡维藩”印章是不是一多先生所刻，恐怕要其后人来辨认，或者与闻一多先生留下的印模比对方知。我曾在网上检索过，发现有一页蔡先生手稿在售，纸幅右下角有一印，与遗落昆明这枚很相似。“皮名举”印直到此稿毕，依然未见传，说东西太多难以找到。

两篇旧短文，一层窗户纸，时隔 30 年才捅破……如今大数据了，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应该会越来越少？当然也未必，心里有，眼里才有。

在浸着闻一多先生鲜血的这方热土，继续做个有心人，是为不负。

本刊地址：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 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电　　话：(86-10)6527.7905　　传真：6513.3283
电子信箱：wenlm1950@163.com